

DECOLONIZATION *and* NATIONALISM

 另类视野
文化 / 社会研究译丛

解殖与民族主义

许宝强 罗永生 /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解殖与民族主义

Decolonization and Nationalism

许宝强 罗永生 /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殖与民族主义/许宝强,罗永生选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另类视野)

ISBN 7-80109-639-8

I. 解... II. ①许...②罗... III. ①殖民地问题—研究—文集
②民族主义—研究—文集 IV. ①D066-53 ②D09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247 号

解殖与民族主义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网 址:<http://www.cct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32 千字

印 张:10.2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导 言：解殖与(后)殖民研究

◆ 罗永生

过去一段长时间，殖民研究以政治及经济分析为主要课题。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政治驾驭和经济掠夺，往往是政治论诤和实践的主要关心对象。20世纪各欧洲大型海外帝国渐次崩解，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澎湃，“反帝”和“反殖”两个政治口号，在亚非拉诸国族建设运动的语境下，变成了无甚差别的同义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词语亦每每交替运用，彼此混淆不清。只是近年在文化研究领域兴起了所谓“后殖民研究”的一股热潮，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时空覆盖范围上的差别、目的和面貌上的不同，以至于过去比较受到忽视的殖民主义文化面向，才开始重新受到研究者重视。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国族/民族主义等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亦渐渐显得需要重新反思。

然而，这并不是说殖民研究只有短浅的历史，或只是属于中国内地思想界所称为“三后”（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或“后学”的那类西方学院时髦思潮。相反地，侧重在心理和文化面向的殖民研究，或对殖民论述的探讨，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后在不同的殖民地出现的殖民心理学研究。曼诺尼（Mannoni）、塞泽尔（Cesaire）、梅米（Memmi）和法农（Fanon），都是在不同意义上目睹或经历了国族主义运动如何在各殖民地抗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处身于这些殖民主义不同形态、环节（moments）之间的过

渡。上述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今日受到参与“(后)殖民研究”者的反复钻研,除了是因为西方学院体制理论专业操作的需求外,更也因为他们的探索,有助于开展对殖民体制下,文化心理操作的更深认识。他们并且留下重重线索,让人们可以反省解除殖民主义(decolonization)这任务的艰巨和险阻。

就如本书所选梅米的《殖民者与受殖者》一书提到,受殖者在文化心理上处于一种持久的两难境地:要么是仿效殖民者,要么就是起来造反。然而,仿效殖民者或追求同化到殖民者的文化价值体系去的做法,根本没有可能让受殖者成功突破殖民关系下根本的不对等情况。反过来说,造反所追求的是民族身份的重拾,重建自我。可是,这种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却仍然是依据着殖民者为受殖者构作的迷思塑像而建成,将原来的负面形象转化为正面形象。于是,受殖者就只有在盲从欧风与排外的自我膨胀两极之间不断摇摆。受殖者如何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完整与自由的人,冲破殖民关系的迷思塑像,是今日解殖民课题的首要工作。

梅米所谈及的迷思塑像,是殖民关系底下衍生的。但殖民关系往往又是(虽不总是)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所强化,所以政治上的反帝斗争,往往被认为是反殖斗争(anti-colonial struggle)的同义语。政治上反帝的诉求如果是被压迫民族的争取独立,建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那反殖运动在文化层面上的诉求,往往就是民族主义。而当建成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被民族主义者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至高理想模式,事事以独立建国为先,民族主义就会蜕变为国族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最终从过去数十年这些新兴国族政权的经验,认识到帝国主义离去后,带给人们的不一定是解放、平等与自由,而是过去压迫形式的复制、转形和变异,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检讨殖民主义与民族/国族主义

的关系,区分以政治斗争为主调的反殖民和全方位(包括深远文化意识反思)的解殖民(decolonization)。而如果殖民关系所塑造出来的文化心理塑像,根本就是潜藏在很多民族/国族反帝斗争背后的想像框架,我们就不可能简单地将文化上的解殖民,视为与政治反帝相平行的文化反帝——虽然文化解殖民的问题,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权力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

萨义德在其著名的东方论述学说中,就曾深入地探讨了文化学术体制与生产“东方”这个刻板定型(stereotype)的关系。不少对萨义德这项东方论述课题的误读,都将他对东方论述的解拆视为反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些给挪用为国族运动或原教旨主义的宣传斗争工具,一些以此非难萨义德理论的完整性,以减弱其政治践行的效用。但在本书选编的《东方学》一书的《前言》和新写的《后记》中,其实萨义德都已很清楚地道出他批评东方论述,一方面是要突显不断生产“东方”的文化操作,是如何紧密地和欧洲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治进程扣连;但另一方面,东方论述作为一个论诤形构,本身就是一个将文化界划僵硬化的意识形态虚构。如果“东方”是一个文化生产制造出来之物,那“西方文化”也并非只是铁板一块。所以,批判东方论述,并非要为“东方如何压倒西方”之类的国族式文化反帝事业服务,而是为探讨如何彻底超越殖民主义而奠下基石。

文化心理层面上解殖民工作的困难,在南迪那里,以下面更彻底的方式被表述出来:他在《亲内的敌人》一书的《导言》说道,我们正处身于一种不单控制人们的身体,更占领了人们的思想,还先占了人们对自身解放条件的认识的第二次殖民化。在这种殖民化当中,不单为人们定下合模的行为,更为异见剪裁了“官方”的样式,他们自以为是参与西方而可以打败西方的参与者(player),或者是对着西方霸权干的参与破坏者(counterplay-

er),但其实都只是像凯撒大帝跟前的马戏团一样的那些被驯服了的竞技者。他们以为可以以参与游戏来学习打败对手或破坏游戏,但结果都只是发展了不同种类的处理那份憎恶自己的方法。所以,这种第二次殖民是一种自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和外压殖民主义(external colonialism)相互纠结的产物。兰迪认为,我们不可能在根除一种殖民主义的同时,不去根除另一种殖民主义。

当今的所谓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突出地探讨和展示了殖民论述和反殖论述的内在矛盾。这些研究所挑战的,既是殖民者过去以其自诩的文化使命,企图全面驾驭和改造受殖者的文明大计的失败,也暴露出民族/国族主义试图重拾受殖者失去的自我时,所面对的困惑和陷阱,它们包括殖民论述和国族论述都往往遗忘及排挤掉的多元文化、离散、流徙、混种等的模棱两可(ambivalence)的经验。它们共同地体现了简化的内部与外部、中心与边陲、殖民与受殖、帝国与本土、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图式所具有的缺陷。然而,不少这些后殖理论,却往往在强调两可经验的同时,过分草率地就将殖民主义的过去,视作明显摆在那儿的事实,从而以一种普遍的所谓后殖民情状(post-coloniality)来作为他们论诂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起点。这种以时序性为基础的“后学”论述,一来过于笼统,无视区域、国情及各地受殖程度与样式之间的差异,二来也不自觉地在模仿着一种帝国式的宏大理论论述结构,妨碍着在地的、杂异的反抗异议的声音发声。所以,如果后殖民研究具有真正的动力,那就是去重新解读殖民历史,清理各种各样殖民主义在文化、心理、意识形态、概念术语、想像结构等,如何透过形象、文本、政策和体制,在新的全球与各地域环境下延衍再生,以打破殖民论诂构成所主导的意象。

本书选译了皮埃特思和巴雷克的《意象的转移》一文,就比较仔细的区分了和三种不同的超越殖民主义事业相联系的意象,探讨了这些意象在不同的抗争境遇下,各自突显的问题和挑战。这里所界划的研究课题,显然比一般化的“后殖理论”和文本分析技巧,更能连结到现实问题,提出更仔细的研究纲领。

当简化的内外对立图式被拆解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族建设事业的优先性立即成为问题。数百年来世界文化发展和各种族群身份、群体生活模式和理想,便变成需要深入反思和检讨的问题。沃勒斯坦的《族群身份的建构》及巴利巴尔的《种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就分别探讨了种族主义、民族/国族主义和族裔身份这几个观念的错综关系。沃勒斯坦将种族主义和国族主义都扣连到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历程,他认为在历史资本主义的要求下,世界建成一个多国系统。在多国系统之内,国家机构的建立,是相应于不同的生产过程在空间上的分布。而种族和国族意识的出现,亦体现了世界体系内与主轴分工相关的地区性集结。种族主义顺应维持中心与边陲对立的格局而存在,国族主义则因应中心内部和边陲内部,以及中心与边陲之间的竞争而得以发展。一如沃勒斯坦所指出,国家机构建设的需要是先于民族认同的意觉,今日生产分工上愈益明显的族裔聚合(ethnicization)现象,也是资本的分工安排和矛盾的体现。他预期各种族裔和群体的身份会随经济系统的运作周而复始地诞生、重组和消亡,并突显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沃勒斯坦的文章,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领域,让我们检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在族群身份问题上的交汇,那么这项分析既动摇了种族、民族、族裔等概念的稳定性,也改变了传统左派分析所特别关注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例如阶级等。也就是说,要了解分工、剥削和阶级分化问题,找寻新的践行策略,亦不

能抽空了种族、民族、族裔等范畴。而这亦是当今文化与社会研究跟政治经济学最能成功交汇，孕育理论和实践洞见和视野的地方。所余下的就是更深地探讨这些范畴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们所描述的社会宰制形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巴利巴尔的《种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就试图在更深广的范围，检讨种族范畴和国族范畴的共犯和冲突。

巴利巴尔质疑了种族主义可以和国族主义分开讨论的看法，虽然他也不以为两者简单地就是同一东西。他认为将两者等同或将两者分隔，都无助我们去了解诸如纳粹主义这种复杂现象，更重要的是妨碍了我们去反思这些范畴互相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不能检视和警醒当今各地反移民浪潮所内含的种族主义想像逻辑。他认为种族主义其实是国族主义的滥溢(excess)，既是为国族主义的巩固而服务，也是国族主义不可或缺的。它甚至不时超出国族主义的视界，破坏了国族主义的事业。巴利巴尔的批评，指向着一种国族主义内藏的倾向，那就是一种结合着现代人文主义的文化优越论，亦即追求建立以自己(国族)形象为本的，更高、更“文明”的人性，以使(自以为)优越的国族文化，领导人类文明，使人有别于兽性和自然。巴利巴尔不认为种族主义借用了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反人本主义，反而是某一种人本主义思考的极致。国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亲与与共犯，就在于种族主义为国族主义开拓了一个让国族主义联结上具有普同性面向(即人类文明水平)的范畴，让国族主义踏上超级国族主义之路。这是纳粹主义由欧洲民族主义孕育，以至今日演化出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因素。他认为要认清理论上的人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犯关系，我们才能在实践上更好地推行践行上的人道主义。他所呼召的是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之外去实践人道主义，它的基本前提是反种族主义。

巴利巴尔细密的历史和论诂逻辑分析,成功地解拆了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和民族/国族主义运动的二元对立关系,也解释了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结束之后,以西方人本主义及进步论为核心的价值,是怎样仍然约制着人们的政治和文化思维。而这种有限的意象,又是如何变种衍生为遍及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国族主义的祸害和冲突。他亦警醒那些为抗衡西方而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背后可能只是复制着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其危险就是种族主义。巴利巴尔的分析既是辩证,亦是解构的,更清楚的是它立基于广义的后殖民情状,直指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非两个对立的选择,而是互相之间充满曲折和吊诡关系。这亦例示了当代文化研究对于粗糙的二元对立思维方法的不满,因而显示一种深思事物复杂性的思想风格;而在实质层面上,他也揭露了国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的复杂纠结。

在印度学者查特吉的《历史与民族》一文当中,就更进一步尖锐而具体地以印度民族主义为例,指出当代印度民族主义对印度历史的自我认识,怎样复制和依循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书写策略。跟很多人认识不同的是,查特吉并非要问印度人的历史如何可以不同于殖民主义为印度人写的历史,如何在历史当中建立印度人的主体性,而是径直指出,历史作为一种处理社群过去的生活经验的一种方式,并不囿限于现代欧洲人所发展出来的那种历史观和编史方法。可是,对被殖民地区来说,现代的民族主义书写方式,却是跟随殖民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建立而流传进来的。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进行详尽的历史考察(也应说包含了各种对风俗、宗教等方面的考察),使这种殖民知识有助于殖民地的管理。这些历史写作的宏大工程,自然不渗进了各种对殖民地下人物、风俗、信仰等各方面的评价、剪裁。由于殖民者进行这些知识活动的时候,都是夹着各种物质上和精神上

的强势地位,这些庞大的编史活动往往造就了殖民地人民自我认同的典范,甚至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自我塑像时所参照的蓝本,那就使得殖民主义成为一种绝对的强势,在政治殖民统治终结之后仍然发挥作用的文化思想霸权。在查特吉笔下,我们看到了印度民族主义内对于印度教和回教族群关系的观点,如何其实是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一段久远的历史书写传统。印度民族主义和国族建构运动,将原来驳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族群关系,简化为雅利安血统的印度教徒,如何从辉煌的古典文化时代,因为受到野蛮的回教徒侵略腐蚀而在今天变得落后,又再如何在进步的路途上,誓死反抗,进行民族复兴的奋斗。一如查特吉详细的编史学批判所指出,这种印度族群关系的描述,与其说是印度历史的真实呈现,不如说是孟加拉地区受英语教育的印度土著精英,意欲模仿欧洲的民族发展史,以欧洲的民族样式来想像印度的民族和社群生活,打造一种类同欧洲式的民族传统而照样在印度复制出来的,以印度教徒为主导的“印度特质”。如此地建立起来的一种民族自身的传统的观点和史学操作方式,虽然是以印度为名,但亦只是殖民文化宰制关系的延衍而已。“民族传统”看似和殖民主义互相对立,但究其实只是后者的一个引申吧了。

后殖民研究要分析殖民主义和民族/国族主义之间表面上看似对立的关系,其实是并不清晰,更难以像楚河汉界般分明的。这其实是一种难度甚高的工作,亦是导致不少后殖民评论家喜欢以一种模棱两可的风格来书写他们所分析的那些混杂不纯的后殖民文化形象的原因。虽然本书收录文章的作者,特别是祖籍或现居印度的学者(包括南迪和查特吉)可能是例外,不少其他的后殖民评论家,往往都会借助来源于西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而得以冒起的理论,例如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以

协助后殖民的分析。然而,借助理论来捕捉后殖民的文化形象的做法,又在西方学院的学术潮流的起伏中,有变成一种纯粹的风格的危险。事实上,由萨义德的东方论述批判开始,西方学院的文化研究就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一场辩论,讨论究竟后殖民研究是否也只是强势的西方学术体制下,另一种持续以“西方理论”取得霸权统治优势位置的学术游戏。后殖理论家们一些理论过分(overtheorize)的倾向,模棱两可的发言立场是促成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些理论观念是否真正有助受殖社群发展其文化抗争策略,理清其在强势的殖民宰制文化下自我的构成的形式,以及所牵涉的权力关系,是十分惹人关注的。如曾引起广泛辩论的东方论述命题,就在强调西方学术体制的权力时,被认为过于概括和单向,缺乏容让受殖社群建立自主的主体性可能。但后殖民研究当中的一些倾向,却又反过来将受殖者反抗与颠覆的可能,作过于浪漫化的处理。特别在一些大量无批判性地借取心理分析和文本分析技巧的后殖研究,这些弱点就很明显。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理论的问题,而是如何将殖民研究的理论探讨和实质调查研究,重新置放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脉络里去。既要处理文本的政治,但也不要以为政治可以在纯文本的世界完成,而是要僭越文本与政治的界限,让文本与抗争主体性的形成,扣上更紧密的关系。

虽然有来自各方对东方论述的批评,但日本青年学者岩渊功一的《共犯的异国情调》,却另辟蹊径地将萨义德的东方论述命题逆转过来,从日本如何环绕来自西方的日本异色形象,透过文化工业对日本人心理文化特性的建构,形成一种所谓自我东方论述。这种在异色眼光底下形成的民族自我,既非惹来反抗,亦非带来同化,而是起着有利于日本国内权力集团操纵和管理人民的作用。这种情况不单在日本工业化及国族主义兴起的时

期发生作用,就是在所谓全球化的年代,日本的经济神话,反更强化了在意色眼镜下,西方与日本共同对所谓“日本特性”的凝视和迷恋。作者的探讨一方面否定了所谓西方文化统识(hegemony)下,被意色凝视民族只是无能消极,至少,日本是主动的挪用来自西方的意色情调;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权势集团在挪用当中,亦是文化宰制过程的共犯者。殖民者与受殖者的二元对立讨论,在此不得不拉开更广阔的分析面向,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分析,衔接了政治和经济的研究,而且将今日仍然存在的殖民关系,不再看成是仅为西方强权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包括了一国之内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的人民百姓之间的关系。这一种思考的角度,大大地扩阔了解殖民工作的范围,从反帝话语的那一种外在式的批评,扩展为追索殖民文化的踪迹至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并且尖锐地提出殖民认同的共犯建构。

解殖民工作作为具有强烈的内在批判性质的文化政治,当然也包括将后殖民研究本身也放回历史当中,是盖茨《评论家笔下的法农主义》的核心题旨。他非常仔细地评论了环绕殖民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家法农而引起的多番论战,参战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后殖评论名家,例如萨义德、斯皮瓦克(Spivak)、巴巴(Bhabha)、穆罕默德(Jan Mohamed)、帕里(Parry)等。他们针对心理分析模型的适用性、后结构主义的适用性、法农对拉康(Lacan)的解读、法农如何“代表”第三世界等问题,展开连串的辩论。盖茨对此不单作出细密的疏解和评论,更引用梅米的法农小传,一一展示这些评论家对法农的挪用,如何背离了历史上的法农,以及他本身投身的政治和面对的困惑,法农变成只是一个可供理论家们发展宏大统一理论的对象,被树立为一个“代表”第三世界的世界级理论家而已。

盖茨的文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示警,显示出在全球解殖民事业的一些根本问题。如果斯皮瓦克的著名命题:“庶民如何可以发声?”足以概括后殖评论塑造的那个文本化的世界,或世界化的文本个中的核心问题框架,那末法农的文本被急切提升为“代表”第三世界发声的世界级理论家,只能显示萨义德所批判的全球文化强势体制不是日薄西山,而是转化为另一种形态。那是一种符合新的全球化政经秩序的形态,也就是说受殖者不再是给完全排斥在全球性的秩序之外,而是以一种族裔代表的身份,给予事先已安排好的发言位置,按日新月异的理论潮流、话语消费起落而说话。在这情况下,“庶民”的“代表”当然可以“发声”,但都只是南迪所谓的经官方剪裁的异见方式,凯撒大帝跟前被驯服了的竞技者而已。南迪所称的这种第二次殖民化,自亦容得下在全球舞台上有终结百年帝国耻辱,让国族文化“吐气扬眉”的日子,但恐怕离全面真正解殖民的日子已愈来愈远了。

文化解殖民的问题的确很复杂,因为殖民主义的文化宰制,并不一定以一种表面上就是赤裸裸的破坏、歧视、压制的态度有关。就正如托马斯在《从过去到现在》一文所指出的,殖民主义文化想像的建立,并不一定只有一种形态,也不一定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受殖民者的贬抑。相反的,殖民主义文化想像的建立过程非常复杂,也各有不同。在很多时候,殖民计划被视为是开化的工作,是进步的、必须的、甚至是善意的。托马斯以当今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态度和政策为例,指出如果我们只能将殖民主义的文化计划设想为只有一种以残酷高压、歧视排斥为主的形态,那我们就会遮掩了一些更诡妙、细致的,但亦更危险的方式。因为今日殖民主义计划之还有可能延续下去,就是依靠这些迂回间接的方式。如果我们停留在一个很有局限的眼光分析角度去

看待殖民主义,我们就无法真正的开展解殖民的批判工作。如果我们认识到,殖民认知和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既有温和的异国情调,也有种族主义徙居者的暴力,问题就会在于如何指出殖民关系的可变性、多样性和历史性。不同历史状况下不同的话语方式,其实都有可能被组织到不同的殖民计划中去。能否指出这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实是文化解殖民计划能否跳出不断蜕变的殖民关系的重要关键。

话语和殖民权力的关系错综复杂,远非不证自明。批判话语亦并非可以安安稳稳地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进行批判,所以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工作,格外要求一种自省的警觉。简单的反帝论述和一些自以为是的后殖民理论,都不利于解殖民工作的开展。反帝话语(及对所谓“殖民压迫”的粗糙了解),框限殖民关系在某种固定形貌之内,使批判工作者以为可以安稳地站在“殖民之后”的世界去看待“过去”,忽略了过去和“现在”一脉相承之处;过度理论化而显得自以为是的后殖民理论,也在种种模棱两可的殖民形象中间,不自觉地 and 吊诡地再制出历史是线性进步的迷思,重演着殖民精英向母国土著展露西方文明开化大计时所展露的启蒙姿态。托马斯所要提出的,正是解殖民批判工作的在世性,话语和现实处境产生各种纠葛关系的历史性。而正因为各种文化话语对他者的处置,都有可能变成殖民计划的共犯,所以抽离当下话语本身的政治性,而安稳地去分析所谓殖民话语是很困难的。因为殖民主义文化宰制的要害之处,正是从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开始。所以,不深入到质疑自我构成的话语批判工作,很难逃脱陷入各种衍生出殖民宰制关系的陷阱。

文化批判工作当中的解殖民工作,可说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案和新的政治取态。它并不祈求这种新的学术政治立场可以有

一个安稳的距离,去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以超然的态度去面对过去数百年殖民主义为我们的世界所造成的改变和破坏,更加不以为殖民主义的历史和影响,可以随一些国家政权宣告独立就能轻率地以为已经过去,以致今日殖民或国族文化的研究者,可以轻松的解除责任。相反的,文化和学术解殖民的立场,与其说是笼统而谈的那种“后学”式的戏玩不恭、模棱两可,不如说是战战兢兢地看待文化和学术生产与历史政治的周旋、纠葛和辩证。文化解殖民的提出,有别于复制西方学院潮流的那种“后学”,因为它试图在宏大理论、强势的学术生产体制的阴影下,在历久不息的“西方”幻影当中,追寻另类社群生活的可能,发掘国族迷思遮盖下潜存的人民生活 and 奋斗的 memory 和主体建立的可能性。在驳杂纷呈的殖民文化图景当中,文化学术工作要坚持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向,但一如这里所选的文章显示,不同的学者对殖民关系的性质,殖民关系的涵盖面,以致解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都是有很不相同的展开的,本书在理论挪用和经验借鉴的层面上,只能算是一个投石问路式的开始吧。

目 录

导言:解殖与(后)殖民研究/罗永生	1
1. 历史与民族	1
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著	
叶荫聪 译 罗永生 校	
2. 殖民者与受殖者	33
梅米(Albert Memmi) 著	
魏元良 译 黄燕堃校	
3. 亲内的敌人(导论)	60
——殖民主义下自我的迷失与重拾	
南迪(Ashis Nandy) 著	
林霭云 译 罗永生 校	
4. 意象的转移	72
——“解殖”、“自内解殖”和“后殖民情状”	
皮埃特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	
巴雷克(Bhikhu Parekh) 合著	
吴江波 译 许兆麟 校	